

近来,网上出现多篇关于《慢教授》的介绍文章。本书作者——在加拿大两所大学英语系任教的玛吉·伯格、芭芭拉·西伯教授吐槽说,在大学“公司化”的背景下,“日复一日,科研愈加滑入管理主义的模式,我们也越来越看不到正在做学问的学者,反而见证了了对机构唯命是从的教员……我们工作生活的品质以及我们学术的品格都因此大受影响”。

于是,他们在参考了一些推崇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大众自助手册以及关于“慢运动”的关键文本后,提出了几个“慢原则”。

国内市场上已经有多本关于当大学教师、走学术道路的译著,比如肯·贝恩的《如何成为卓越的大学教师》,萨拉·德拉蒙特、保罗·阿特金森、奥德特·帕里合著的《给研究生导师的建议》,亚历山大·马古利斯的《成功之路》等。

《慢教授》并非像上述三本书那样以初入职场的青年教师为读者对象,“手把手”地传授“如何做”的实用经验,也不是随笔集,而是结合大量文献和作者自己作为“慢教授”的经历,提出了“慢教授宣言”。

国内图书市场上也有不少关于“慢生活”、心灵成长的译著,比如布鲁克·麦卡拉里的《慢的艺术》,厄尼·泽林斯基的《懒人也能成功》,谢莉·科特-斯科特的《人生的规则:灵性成长之旅》。

本书较少讲生活,而是集中讲解在学术界如何使用“慢原则”。作者似乎不大认同一些时间管理畅销书的经验,认为那不是长久之计。相反,作者提倡在学术方面“从容思考,而不是仓促地加速”。

二

这本书的关键之处是,能击中高教界的痛点——如今,大学教师费力地通过制造“学术GDP”来满足考核、申请项目、评职称的要求,时间碎片化、工作内容碎片化,教师抑郁、英年早逝屡见报端。

但问题是,这本书能否解决高教界的实际问题?生存“压力山大”的青年教师读了这本书,能收获什么?一位网友在微信推文后留言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想慢,但世界不让我们慢下来!”

我们知道,学术界的资源(科研经费、职称等)是有限的。谁能在短时间内有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谁就能脱颖而出,进而获得资源的倾斜。而一旦从学校或者从项目资助机构获得了

谁是真正的恶者?

■ 鞠芳玉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曾说:“邪恶不单只是表面上的样子。”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看到邪恶的本质,更难估算与它的距离,因为我们或许就身在其中。

2019年,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成为年度现象级口碑剧。最近,包含剧本、主创人员访谈、导读等的新书《我们与恶的距离》出版。

书中的王赦律师承接人神共愤的随机杀人案辩护,却说:“他们是罪人,不是恶人。”这句话出一个问题:杀人触法的人不是恶人,谁会恶人?萨特的例子为邪恶不只是表面的样子,触法难道不是邪恶的直接标准?

或许举两个真实案例,就会明白罪人与邪恶不一定画上等号。

2014年某日午时,在医院病房内,一位卧床的老妇人遭人以水果刀刺入左胸而死亡。凶手是她的丈夫,判决记载他不忍妻子长年重病卧床,自付精力、经济无法负担照顾重责,也忧心子女刚成家立业,难以负担照顾老父病母的身心及财务压力,因此起行凶。最后法院认为“客观上引起一般同情而显可悯恕”,判决:杀人,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另一则是一名21岁身心障碍的年轻人无力工作,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内贫困,三餐不继。一晚家中瓦斯使用殆尽,他念及母亲在外辛劳一天,回家却无瓦斯可供应热水,于是夜里窃取邻居的瓦斯桶。

从这两则事件看,这名老者与年轻人或许是罪人,但不一定是恶人。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提到,“犯罪是对社会组织不正常现象的一种抗议,如果社会组织正常,一切犯罪行为就会消灭。”因此,我们很难从犯罪直接断定邪恶的本质,甚至犯罪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的病兆,那么,谁是恶者?

若说人生如棋盘,棋盘是黑白棋的对决,如卡通或英雄剧中正邪的对立,我们很明白它们的距离。然而等你活得够久,也够明白,或许会发现我们不会永远是持白棋的人,我们偶尔会换局持黑棋,也或许无法分辨棋子的颜色,就如同找不到真正的邪恶。

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旁听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公审,她发现:“邪恶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无法言喻又难以理解的恶。”真正的邪恶藏在欠缺思考的平庸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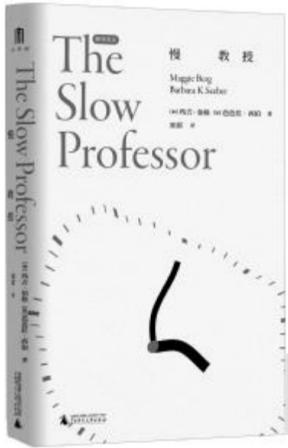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在法治的社会结构下,究竟为何衍生出这些无法预测的随机杀人事件,严重割裂社会安全网?

这本书很大胆,因为它把世人最容易理解的邪恶如杀人、最期待的罚如死刑,通过每个角色的叙事,叩问这个“简单”,带入“思辨”。

它试图从黑白棋对弈的迷局找到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罪人、犯罪受害者、媒体、律师的位置,让读者看到每个位置的困境,也让每个位置

教授,慢下来!

■ 马臻



“本书能否解决高教界的实际问题?生存“压力山大”的青年教师读了这本书,能收获什么?一位网友留言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想慢,但世界不让我们慢下来!”

《慢教授》, [加] 玛吉·伯格、芭芭拉·西伯著, 田雷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定价: 79元

资金支持,大学教师就不得不停地产“可以展示的成果”来“交账”。在如今“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大学提出了更加“高大上”的整体目标,各项任务指标都得层层分解、压实,担子最终落在教师肩上。

在这样的氛围中,“快教授”大行其道。然而,我们还是要理解“慢教授”存在的意义。

一位研究凝聚态物理的老师告诉我,不少发表在高端刊物的论文被后续的研究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原作者急着发表论文,就没有深入研究。有鉴于此,她指导学生不厌其烦地补做实验、深入分析实验数据、修改论文,哪怕论文只是发表于非高端的专业刊物。事实上,

她以前在美国求学期间的两位导师也是“慢教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要把《慢教授》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号召“发论文要慢”。事实上,这本书就像其他很多关于“慢生活”的书那样,更是倡导一种心态、一套方法。虽然作者强调用“慢原则”来指导学术研究,但是我也能在别的方面找到启发和共鸣。

比如“不被时间所管理”——“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一个人沉浸在某个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从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自己”。我就经常体验到这种“心流”或者“物我两忘”状态——跟学生讨论,面对电脑屏

的人互相辩论,直到理解或和解。

王赦是出卖灵魂的恶人吗?

李晓明在戏院随机杀人,造成多名受害者死亡,王赦担任李晓明的辩护律师。他不仅承办该案,还担任杀死女童案辩护人,为何屡接如此惨绝人寰案件?他说:“要理解李晓明犯罪动机的背后脉络,才能预防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要探究李晓明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他不是为了利,因为法律援助基金会给的酬金,少到仅够支付阅卷费和几趟车资而已。难道为了名?然而承办如此惊悚的案件,招致自己被无止境地咒骂与攻击,甚至波及家人,谁该争这种恶名?他只是个本于良心为社会安全找答案的人。

书中死者家属代表人物乔安,她与恶就站在对立面吗?

除了受害者身份,乔安同时代表媒体——所有社会大众对于正义的转态者,双重身份让她有无法被挑战立场的资格。但书中很巧妙地安排她与属属下大芝,也就是加害人李晓明的妹妹共事,擦出不少火花并点出一个问题:“媒体杀人”。

乔安说:“我们就是无良媒体……从小到你跟哥哥相处,他是怎么样的人,你觉得你们家庭教育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早一步了解他,他可能不会犯下这种滔天大罪……”而大芝回应:“我哥是杀了很多,但我们一家人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乔安与恶有绝对的距离吗?

罪人李晓明是恶人吗?

20年前美国科伦拜高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其中一名加害者迪伦的母亲苏·克莱博尔德多年后在TED演讲,她说:“这么多年来我不间断问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这听起来很简单,却至今没有答案。”她在《我的孩子是凶手》一书中写道:“他是邪恶的吗?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这个问题。”

这本书对李晓明案件没有给出答案,却明确地探讨更多关于直觉失调症患者、更生人及其家人遭到社会歧视的议题,似乎隐讳地指出邪恶本质,那就是社会的偏见,以及迫不及待的排斥、隔离,呼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犯罪源自对社会组织不正常的抗议。

不过,我认为这本书藏在最深处的意涵是:邪恶来自欠缺思考的危险。而你我都可能正在走向邪恶,却毫无所知。

(本文系《我们与恶的距离》一书导言,有删减)



《我们与恶的距离》, 吕蔚媛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后浪出版公司, 2020年2月出版, 定价: 82元

生命与体悟

■ 肖磊

“知行合一、理论结合实践……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说法,已经越来越难以用于辨认中国文化的特征。”



《体悟力: 楼宇烈的北大哲学课》, 楼宇烈著, 焦雁君编, 中华书局, 2020年7月出版, 定价: 30元

近代工业兴起以来,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大。机器的声响和火车的轰鸣,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应接不暇的信息,现代人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福利,然而,嘈杂的声响和炫目的光彩也使得很多现代心灵迷失于其中。

《吕氏春秋·本生》中对这种情况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上万人操弓同射一个箭靶,箭靶肯定会被射中;纷繁的万物来戕害生命,生命也肯定会受到伤害;然而假如懂得利用万物来养护生命,那生命也会因滋养而成长。

“物化”还是“化物”,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化的核心议题。

然而在一个以知识学习为主的教育体系之内,这个主题却难占一席之地,概因其中的相关内容在各学科专业的划分中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成为一种纯粹认知的对象,而失去与自身生命的直接关联。

《体悟力: 楼宇烈的北大哲学课》一书是87岁的楼宇烈先生历年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汇编。以“体悟力”一词作为书名,有其独到的用意。

知行合一、理论结合实践……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说法,已经越来越难以用于辨认中国文化的特征,假如说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知行合一、难道西方人提倡知行分离吗?虽然柏拉图一脉的理念论者带有某种知行相分的气质,但亚里士多德还是把重视从观察中获取知识,而西方近代科学更毫无疑问是提倡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但是,我们很难说近

幕写稿、修改论文、翻阅报纸、看书时,时间仿佛停止了。

一篇论文发表了,一本书出版了,或者一份项目申请获批了,都是令人欣喜的。但其实每一位学者都有一份自己的“影子简历”——那些走过的岔路、拖延和放弃,对于“影子”里的经验教训,要有勇气谈笑风生。

我自己也会阶段性地在电脑文档里梳理各种经历,比如和课题组研究生探讨从论文投稿到发表的时间节点和编辑处理结论、最近几年工作的得与失,记录掉进遗忘的“思想的火花”,等等。

三

本书还揭示了一个奥秘——“等”。作者提到,曾有一次,一本书稿还没有准备好就被递交给出版社,结果书稿被拒。在学术休假期间,作者有更多的时间修改书稿,最终书稿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这个例子具有普遍性,常常能看到。很多事情没有成功,只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或者时机还不成熟。换言之,你付出的时间最终是有可能“兑现”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人就能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失”。

总之,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是,在前进的过程中,不但要务实,要使巧劲,还要调整好心态。要增加生命的“厚度”,而不是一味地“赶路”。

如今,大学不再是理想化的“象牙塔”,大学教师也可能会遇到职业瓶颈。比如现在普通教师较难申请到项目资助。为了拿到项目,就不得不不停地催促学生发表论文,但很多硕士研究生需要外出实习、找工作。因此,“方程式配不平”的现象很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教师得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与势俱进、顺势而为。比如,有的人沉住气“十年磨一剑”,做着自己喜欢的科研,对晋升职称不十分在意;有的人静下心来撰写教材或者专心从事教学,还有的人转做行政管理。当然,也有的人离开了“象牙塔”,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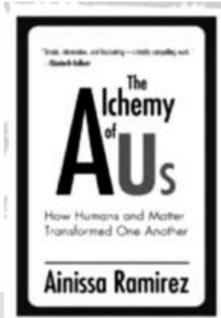
指导学生、探索科学世界、为社会发展添砖加瓦只是大学教师存在的部分意义。另外一部分意义,在于理解自己、探索自己、发展自己,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自己从做事的过程中收获了什么。

本书作者从写书、教学、与同事相处中收获了快乐,如果我们能从从容思考、用心感受,那么我们也从工作和生活中收获满满。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域外

拉米雷斯的身份让她特别注意描述由黑人和女性做出的发明和技术贡献,它们往往被很多科技史文献所忽略遗忘。



2020年4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材料科学家、科普作家 Ainissa Ramirez (艾因伊萨·拉米雷斯)的《The Alchemy of Us: How Humans and Matter Transformed One Another》(本文作者译为“人类之脱胎换骨:人类和材料是如何相互改造的”)。

拉米雷斯是美国黑人女性,生于1969年,拥有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先供职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然后去耶鲁大学任教,做过机械工程专业的副教授,讲课深受欢迎。她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其中一项入选麻省理工学院评出的“百佳年轻创新者奖”。

她还热衷于科普,为很多著名刊物撰写过科普文章,包括《时代》周刊、《大西洋月刊》、《科学》周刊、《科学美国人》、《美国科学家》等,多次在广播电视台做科普节目,在TED平台发表科普演讲。除了本书外,她还在2013年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拯救我们的科学:如何激励新一代科学家》,另一本是与人合著的《牛顿的足球》。

拉米雷斯在《人类之脱胎换骨》一书中论证说,人类一直在以种种方式鼓捣各种材料,从钢铁到硅。与此同时,相关材料技术也在不知不觉地形塑着人类的身体和社会。她重点介绍了8种重要的发明及其涉及的材料技术:时钟、钢轨、铜芯电报线、摄影胶卷、用于电灯泡的碳丝、硬盘、科学实验室器具设备、硅芯片。

精确度越来越高的时钟(起初离不开钢质游丝,后来离不开石英晶体)使得社会能协同有序地运转。由于工业革命最关注的是工厂作业时间表,人们对时间的规划越来越精确,于是人类的睡眠习惯就“遭殃”了。同样,碳丝电灯泡使人们每天可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和娱乐,却干扰了人体的生物节律,给健康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不过,连带效应并非全是负面的。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铜芯或铁芯电报线使得美国大陆的消息传递速度大大提升。电报技术诞生后,新闻记者可以从遥远的采访地点将文稿发回报社总部,从而催生了对篇幅较短的报道的强烈需求,美国报纸的总体行文风格因此逐渐发生改变。拉米雷斯说,正是美国报纸所欢迎的这种表达方式催生了造就了以海明威为典型代表的简明扼要的文风。

拉米雷斯从科技史文献中采撷了众多不为人知但趣味盎然的小故事,对故事背后的材料科学提供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她小心地选择故事的主角,有意识避开“孤独科学天才”的老套路。于是,我们在书中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林林总总的故事。

例如,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Ruth Belville女士随身带着一只非常准确的怀表,做“出售钟点”的生意;在20世纪70年代,拍过数码相机公司的女化学家 Caroline Hunter 和摄影师 Ken Williams 与公司老板对抗,反对将本公司的即时摄影技术用于监视处于种族隔离状态的南非黑人。拉米雷斯的身份让她特别注意描述由黑人和女性做出的发明和技术贡献,它们往往被很多科技史文献所忽略遗忘。

在科学史写作中难免有对科学家“英雄”崇拜的倾向,但拉米雷斯抵制这一倾向,不惮于指出她所描写的人物的失败、失误和缺陷。例如,她告诉我们,电报之父塞缪尔·莫尔斯是支持奴隶制的,是拼命攻击外来移民的。

作者的书写激情是具有感染力的。例如她写道,“碳与铁的结合导致奇迹般的变化”,出现了钢这种神奇材料,其像蛋糕一样的层状结构使得它既具有高强度,又具有延展性。她在后来的章节中又多次提及钢材,因为那些章节涉及的技术依赖于高水平的钢材生产。

拉米雷斯特别善于在看起来相距遥远的科学和文化之间找到相互关联。本书要传达的关键信息也很简单:材料以我们意料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意识到这一效应,社会便就可以就如何应对做出主动选择。

材料以意料不到的方式改变我们

■ 武夷山